

偉烈亞力《中國文獻解題》 所載基督教中文文獻來源考述*

李 真

[提 要] 英國漢學家偉烈亞力(Alexander Wylie)的《中國文獻解題》(1867)著錄2,000餘種中國古代典籍,超過此前任何一部由西人編纂的漢籍目錄,為西方漢學史上第一部以西文撰寫的較完備的中文文獻指南目錄。該書首次採用四部分類法對中國古代典籍進行大規模詳盡介紹,以指導西方學者的漢學研究,同類著作此前在西方世界很少出現,因此在漢學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書中所收除中文典籍和少量西學漢籍外,在“子部·雜家”類還彙集了逾90部基督教中文文獻,時間跨度從晚明到晚清,包括天主教與新教傳教士的宣教作品以及奉教文人的護教文獻,成為明清之際中西文化離糅的重要見證。本文著重探討了這些宗教作品的作者背景、特點、版本等,考察了所載書目的知識來源和參考資料,初步釐清了明清基督教中文文獻目錄的源頭史料,明確了偉烈亞力在編纂過程中從選目到提要所採用的中西資料線索來源。

[關鍵詞] 西方漢學史 偉烈亞力 《中國文獻解題》 基督教中文文獻 中西文化交流

[中圖分類號] G256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24) 04 - 0094 - 11

《中國文獻解題》(*Notes on Chinese Literature*)是英國漢學家偉烈亞力(Alexander Wylie)以英文撰寫的一部中國古代典籍提要式目錄。^①偉烈亞力於1847至1877年間三度來華,曾任大英聖書公會(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駐華代理人 and 《教務雜誌》(*Chinese Recorder*)編輯,並參與創辦皇家亞洲文會北華支會。他精通中、法、德、俄、滿、蒙等語言文字,學識淵博,著述頗豐,涵蓋中國宗教、歷史、語言、科技、文獻學、邊疆史等方面。在墨海書館工作期間,他與王韜、李善蘭等人合作翻譯了大批西學書籍,並積極譯介中國古代典籍,為西學東漸和中學西傳做出了巨大貢獻。

在偉烈亞力的諸多中西文論著中,《中國文獻解題》可謂其多年漢學研究之集大成者。該書1867年初版共計260頁,著錄了2,000多部中國古代典籍,與比其晚出約十年的張之洞《書目答問》收書數量大致相當。所錄之書均撰有詳略不等的提要,重要典籍的提要往往長達千字,詳細敘述了著作的作者、內容、特點與價值等。分類方面,該書摒棄了此前西人所編漢籍目錄常用的學科分類

* 本文係國家社科基金項目“英國漢學家偉烈亞力《中國文獻解題》譯注與研究”的階段性成果。

法,首次採用了中國傳統的經史子集四部分類法。從西方漢學史的角度來看,該書是目前所見西人所編的第一部完整的中國文獻解題式指南目錄,一方面首次向西方描述了中國古代典籍的全貌,另一方面也為西人學習漢語和中國文化指點了門徑。偉烈亞力因編著此書在西方漢學界獲得巨大聲譽,晚清著名的英國傳教士漢學家艾約瑟(Joseph Edkins)將他與翻譯中國經典的理雅各(James Legge)相提並論,稱其為“遠東領域最博學多識的蘇格蘭人”。

《中國文獻解題》以目錄學的體例向西方人介紹了如何科學有效地研讀中國傳統文獻,並在論述中關照了古典文獻的內容、特點、性質及其版本流傳情況,同時輔以各種中國文化背景知識的詮釋。除了輯錄豐富的中文文獻與一部分西學漢籍之外,頗具特色的是在“子部”的“雜家”類還收錄了90餘部基督教中文作品,時間跨度從晚明到晚清,既有早期天主教和後期新教入華傳教士的宣教著作,也有明清奉教文人的護教作品。偉烈亞力在編纂中文文獻書目時較多參考了《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相較而言,這部分宗教作品的知識來源和參考資料信息相對缺乏。本文擬從這批基督教中文文獻入手,具體考察這些書籍的作者群體和版本特徵,偉氏採用了何種資料及其編纂過程,試圖從新的視角來探討《中國文獻解題》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典籍流傳史上所承載的重要學術價值。

一、所收基督宗教文獻概況

偉烈亞力提到,“現存最早的中文基督教文獻,其歷史可追溯至17世紀初期。耶穌會士入華後,著手利用印刷技術傳播其宗教信仰。這些傳教士留下的著作,無疑具有極高的研究價值,因為它們包含了對這個帝國最早的福音宣告。其中一些書籍因精心編纂,甚至被收錄於皇家目錄之中,成為珍貴的歷史文獻。”^②他原本認為這些作品應單獨分類,但考慮到清朝官方在編纂《四庫全書總目》時已將傳教士的作品歸入“雜家”,故本書也遵從此例。

以下為《中國文獻解題》所收之基督教中文文獻,筆者統計共90部。^③其選目的資料來源主要有三:《聖教信證》梵蒂岡藏本;《聖教信證》法國藏本;1857年《倫敦會藏書目錄》。後文有詳考,此處僅標注作品來源之異同。

同時可見於《聖教信證》梵蒂岡藏本、法國藏本及《倫敦會藏書目錄》的文獻有(部分書名略有差異):《畸人十篇》(利瑪竇);《七克》(龐迪我);《龐子遺詮》(龐迪我);《聖母行實》(高一志);《空際格致》(高一志);《聖經直解》(陽瑪諾);《輕世金言》(陽瑪諾,譯作,倫敦會目錄為《輕世金書》);《靈言蠡勺》(畢方濟);《睡畫二答》(畢方濟,梵蒂岡和法國藏本均錄二書為《睡答》《畫答》,倫敦會目錄為《睡畫答》);《天主降生言行紀略》(艾儒略);《萬物真原》(艾儒略);《四字經》(艾儒略,倫敦會目錄為《天主聖教四字經文》);《大西利先生行跡》(艾儒略,梵蒂岡藏本為《利瑪竇行實》、法國藏本為《利瑪竇行略》、倫敦會目錄為《泰西利瑪竇行跡》);《天階》(潘國光);《教要序論》(南懷仁);《善生福終正路》(陸安德)。

同時可見於《聖教信證》梵蒂岡藏本和法國藏本的文獻有(部分書名略有差異):《交友論》(利瑪竇);《天主實義》(利瑪竇);《二十五言》(利瑪竇);《辯學遺牘》(利瑪竇);《靈魂道體說》(龍華民);《況義》(金尼閣,翻譯改編自《意拾》[即《伊索寓言》]);《彌撒祭義》(艾儒略,梵蒂岡藏本為《昭事祭義》);《滌罪正規》(艾儒略);《三山論學紀》(艾儒略,書名錄為《三山論學》);《領聖體要理》(艾儒略,書名錄為《聖體要理》);《聖夢歌》(艾儒略,譯作);《助善終經》(伏若望,譯作);《聖記百言》(羅雅谷,譯作);《提正編》(賈誼睦);《不得已辯》(利類思);《聖體答疑》(南懷仁);《告解

原義》(南懷仁);《真福直指》(陸安德)。

以下文獻可見於《聖教信證》法圖藏本及倫敦會目錄:《聖母小日課經》(利類思,譯作);《已亡者日課經》(利類思,譯作)。

下列文獻僅見於倫敦會目錄(部分書名略有差異):《闡釋氏諸妄》(徐光啟);《遵主聖範》(陽瑪諾,譯作);《耶穌言行紀略》(艾儒略,為《天主降生言行紀略》縮略版);《瞻禮口鐸》(潘國光);《慎思錄》(李其香);《聖教明徵》(萬濟國);《四終略意》(白多瑪);《聖教切要》(白多瑪);《真道自證》(沙守信);《聖體仁愛經規條》(馮秉正);《聖年廣益》(馮秉正);《聖經廣益》(馮秉正);《盛世芻蕘》(馮秉正);《主經體味》(殷弘緒);《逆耳忠言》(殷弘緒);《易簡禱藝》^④(沈若瑟);《聖教淺說》(佚名);《聖教要經》(依納爵);《週年主日口鐸》(陸思默);《週年瞻禮公經》(佚名,書名錄為《週年瞻禮》);《歸真集》(徐亦良);《初會問答》(石鐸球);《解迷論》(姚鶴鳴);《聖教詩辭歌賦》(佚名);《便蒙歌》(佚名);《早晚課》(佚名);《聖教要理問答》(佚名,書名錄為《要理問答》);《耶穌受難聖路善工》(佚名,書名錄為《聖路善工》);《謝恩祈禱通功經》(佚名);《新添瞻禮經規》(佚名);《聖教直講》(佚名,上海方言)。

以下文獻《聖教信證》梵蒂岡藏本、法國藏本及倫敦會目錄均未收錄:《辯學疏稿》(徐光啟);《崇一堂日記隨筆》(湯若望);《聖教信證》(韓霖、張庚);《格致奧略》(羅明亮);《天儒同異考》(諸際南);《實踐錄》(德沛);《慎思指南》(佚名);《成人要集》(利安定);《德行譜》(巴多明);《拯世略說》(朱宗元);《答客問》(朱宗元);《聖教小引》(范中);《聖教要理》(魯日滿);《恩赦略說》(佚名);《家學淺論》(佚名);《天堂直路》(佚名);《道與主言次序法》(佚名);《備忘錄》(佚名);《諸會問答》(南有岳);《煉靈七次通功經》(佚名);《十誡便提》(佚名);《日課撮要》(佚名);《袖珍日課》(佚名)。需要注意的是,《天儒同異考》實為張星曜所作,而非諸際南,或係偉氏誤認。

在提及的利瑪竇作品中,偉烈亞力稱利氏於1609年撰有一篇作品附在《畸人十篇》之後,包括八首歐洲讚美詩的譯文及評注,但未給出篇名;經筆者查證,該作品即《四庫全書總目》所言《西琴曲意》:“末附《西琴曲義》八章,乃萬曆庚子利瑪竇觀京師所獻”。^⑤目前所見利氏《西琴曲意》未有單行本面世,均以附錄形式置於《畸人十篇》之後,故本文統計數量時也未將該作品單列,仍與《畸人十篇》合為一部。另有提及歸於利氏名下的《辯學遺牘》^⑥一書,解題稱其主要內容為當時的仕宦虞淳熙對利瑪竇非議佛教有所不滿,專門去信與之商榷,利氏回信論辯佛教與天主教之異同;還附有高僧蓮池和尚三篇針對天主教的文章,以及利氏的辯駁,故偉烈亞力將該書算作傳教士作品。

二、所收作品具體分析

上述90部作品中,依作者身份可初步分為三類:傳教士作品(59部)、奉教文人作品(11部)和佚名作品(20部)。傳教士作者中有姓名可考的共計30人,著有59部作品。偉烈亞力所錄的這些傳教士有的列出西文名和漢文名,有的僅給出漢文名,為方便研究,筆者逐一查找並統計了他們的國籍、修會、中西文名字及所收作品數量,具體情況如下:

多明我會:[西]萬濟國(Francisco Varo),1部

方濟各會:[西]利安定(Agustín de San Pascual),1部;[西]石鐸球(Pedro de la Piñuela),1部

奧斯定會:[西]白多瑪(Tomas Ortiz),2部;[?]伊納爵(Ignatius),1部

耶穌會:[意]利瑪竇(Matthieu Ricci),5部;[意]龍華氏(Nicolas Longobardi),1部;[西]龐迪我(Didace de Pantoja),2部;[意]高一志(Alphonse Vagnoni),2部;[葡]陽瑪諾(Emmanuel Diaz),

3 部;〔比〕金尼閣(Nicolas Trigault), 1 部;〔意〕畢方濟(François Smbiasi), 2 部;〔意〕艾儒略(Jules Aleni), 10 部;〔德〕湯若望(Jean Adam Schall von Bell), 1 部;〔葡〕伏若望(Jean Froes), 1 部;〔意〕羅雅谷(Jacques Rho), 1 部;〔意〕賈誼睦(Jérôme de Gravina), 1 部;〔意〕利類思(Louis Buglio), 3 部;〔意〕潘國光(François Brancati), 2 部;〔比〕南懷仁(Ferdinand Verbiest), 3 部;〔意〕陸安德(André-Jean Lubelli), 2 部;〔?〕羅明堯(Lo Min-Yao), 1 部;〔法〕沙守信(Émeric de Chavagnac), 1 部;〔法〕馮秉正(Joseph-François-Marie-Anne de Moyriac de Mailla), 4 部;〔法〕殷弘緒(François-Xavier d'Entrecolles), 2 部;〔中〕沈若瑟(Joseph Saraiva), 1 部;〔中〕陸思默(Dominique Lou), 1 部;〔法〕巴多明(Dominique Parrenin), 1 部;〔比〕魯日滿(François de Rougemont), 1 部;〔?〕南有岳(Nân Yèw-yö), 1 部。

由上可知,在收錄的 30 位傳教士中,若按國籍統計,意大利籍最多,有 10 人;西班牙籍 5 人,法國籍 4 人,葡萄牙籍 2 人,比利時籍 3 人,中國籍 2 人,德國籍 1 人,另有國籍不明的 3 人。若按修會統計,多明我會士僅錄 1 人,作品 1 部;方濟各會士錄 2 人,作品 2 部;奧斯定會士錄 2 人,作品共 3 部;而收錄之耶穌會士人數為最,有 25 人(含兩位中國籍耶穌會士),作品共計 53 部。就傳教士個人而言,收錄作品最多的是艾儒略,共 10 部作品入選;其次為利瑪竇,收入 5 部作品;再次為馮秉正,收入 4 部作品;另有收入 3 部作品的陽瑪諾、利類思和南懷仁;收入 2 部作品的包括白多瑪、龐迪我、高一志、畢方濟、潘國光和陸安德,其餘各人均為 1 部作品入選。

中國奉教文人作品的具體情況如下:《辯學疏稿》及《闡釋氏諸妄》(徐光啟);《慎思錄》(李其香著,李所良編);《聖教信證》(韓霖、張庚);《天儒同異考》(張星曜,偉氏誤作“諸際南”);《實踐錄》(德沛);《歸真集》(徐亦良);《拯世略說》《答客問》(朱宗元);《聖教小引》(范中);《解迷論》(姚鶴鳴)。所錄中國基督徒作品中,有名有姓的奉教文人共計 11 人,著有 11 部作品。其中,徐光啟、朱宗元之作品各錄 2 部;韓霖、張庚二人合著一部《聖教信證》;另《慎思錄》一書為李九標(其香)生前文章,由其子李所良彙編而成。

三、文獻來源考

據《中國文獻解題》前言所說,偉烈亞力輯錄傳教士中文作品時發現了一份特殊資料,是一本名為《聖教信證》(*Shing keáu sin ching*)的中文小冊子,沒有出版年份,作者署名是兩位中國本地的天主教皈依者。^⑦這本小冊子對 1681 年之前的在華耶穌會士做了一系列簡短介紹,並介紹了出自他們之手的一些出版物。不過,偉烈亞力在前言中並未提及撰寫該書的兩位中國信徒的名字,而《聖教信證》則被收錄在《中國文獻解題》正文書目第三部分“子部”的“雜家·基督教中文文獻”中,並明確指出是由奉教文人韓霖和張庚所著。偉烈亞力認為,這份資料提供了大量關於早期來華耶穌會士的著述信息。據謝輝考證,實際上這份耶穌會神父名錄並非《聖教信證》的主體內容,而是附在其後的《耶穌會西來諸位先生姓氏》^⑧(後文簡稱《姓氏》),收錄從聖方濟各·沙勿略(Saint François Xavier)到徐日昇(Thomas Pereira)共 92 位來華耶穌會士的國籍、生平、傳教地、去世之年、葬地及所著之書。因此,若以《聖教信證》來指代這份名錄,其實並不準確。

《聖教信證》目前有兩種常見的版本,以梵蒂岡圖書館藏本和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本為代表。王重民曾言:“《聖教信證》有兩刻本,甲本紀事至康熙十七年,乙本至二十三年”^⑨,實為對這兩個版本極為準確的描述。

梵蒂岡藏本現存五部^⑩,其中三部(編號 RACCOLTA GENERALE ORIENTE III 222. 10\ 222.11

\ 246.6) 為比利時耶穌會士柏應理(Phillip Couplet)於康熙二十一年(1682)回歐洲時帶歸入藏。這個版本卷端題“後學晉絳韓霖、閩漳張賡暨同志公述”，所載傳教士為92位，自西班牙耶穌會士沙勿略始，終於葡萄牙耶穌會士徐日昇。所載傳教士事蹟，時間最晚至康熙十七年(1678)，所錄事件為法國耶穌會士穆宜各(Nicolas Motel)、穆格我(Clauder Motel)移葬湖廣武昌。據考原編纂者韓霖、張賡此時已離世，故可推斷應當是後人增補重刻版本。^⑪

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本所錄《姓氏》也附於《聖教信證》之後，但與梵蒂岡藏本相比有諸多不同，已有學者做了初步考察，此處不再贅述。^⑫這個版本應當是根據梵蒂岡本翻刻，雖也始於沙勿略，終於徐日昇，但對傳教士人數、生平事蹟等有所增刪。筆者考證，梵蒂岡藏本錄“魯日滿”而法國藏本無，法國藏本錄“恩理格”和“聶仲遷”而梵蒂岡藏本無，但法國藏本又重複收錄“陸安德”，故法國藏本傳教士名錄實為93人。此本所記傳教士事蹟，最晚至奧地利耶穌會士恩理格(Christian Herdtricht)於康熙二十三年(1684)去世。謝輝考查此本流傳較少，除法圖藏本外，僅耶穌會羅馬檔案館還有一個藏本。^⑬

柏應理後來以《聖教信證》所附《姓氏》的中文版為基礎，將其翻譯成拉丁文。在此基礎上，他又增加了10餘位傳教士，從沙勿略到都加祿(Mgr. Charles Turcotti)共計105位。該譯本於1686年在巴黎出版單行本，書名全稱為《耶穌會神父名錄——在聖方濟各·沙勿略辭世後，(他們)自1581年至1681年在中華帝國傳播了耶穌基督信仰，收錄了每個人的名字、國籍、入會時間、傳教活動、去世、安葬以及用中文出版的書籍》(*Catalogus Patrum Societatis Jesu, Qui post obitum S. Francisci Xaverii primo faeculo, five ab anno 1581. usque ad 1681. in Imperio Sinarum Jesu-Christi Fidem propagarunt. Ubi singulorum nomina, patria, ingressus, predicatio, mors, sepultura, libri Sinice editi recensentur*)。現奧地利國家圖書館有一個藏本。^⑭除這一單行本外，柏應理還將其發表在南懷仁的作品《歐洲天文學》(*Astronomia Europaea*)^⑮中，於1687年出版。

按偉烈亞力所言，《中國文獻解題》正文書目所輯錄的90部基督教中文作品，有相當一部分來源於《耶穌會西來諸位先生姓氏》和柏應理的拉丁文譯本《耶穌會神父名錄》所提供的資料。由於《姓氏》現有兩個版本，首先需要考察偉烈亞力主要是以哪個版本為基礎。據考，《中國文獻解題》錄入“魯日滿”的《聖教要理》，而梵蒂岡藏本有“魯日滿”條目但法國藏本無；由此首先可知他手中至少有上述梵蒂岡藏本《姓氏》。不過，若進一步考察一些細節，就會發現，實際上他也同時使用了法國藏本的材料。下面以“利類思”條目為例：

【梵蒂岡藏本】內容如下：

利類思 字再可

西濟利亞國人。明崇禎十年丁丑至，傳教江南、浙江、四川等處。清朝定鼎，駐修輦轂下。蒙今上時加寵渥。(此下墨釘三行半)

著《超性學要》目錄四卷、《天主性體》六卷、《三位一體》三卷、《萬物原始》一卷、《天神》五卷、《六日工》一卷、《靈魂》六卷、《首人受造》四卷、《主教要旨》、《不得已辯》、《昭事經典》、《司鐸典要》、《七聖事禮典》、《司鐸課典》、《聖教簡要》、《正教約徵》、《獅子說》、《進呈鷹論》。(此下墨釘五行半)

【法國藏本】內容如下：

利類思 字再可

西濟利亞國人。明崇禎十年丁丑至，傳教江南、浙江、四川等處。清朝定鼎，駐修輦轂

下。蒙今上時加寵渥。(康熙二十一年臥疾,屢荷皇上遣侍衛存問。至危篤之日,復遣侍衛捧上諭,至前宣讀。賜銀二百兩、大緞十疋。及逝亡時,特差侍衛大^⑮三員賜茶酒哭奠。迨出葬之日,差侍衛三員送至塋地。)^⑯

著《超性學要》目錄四卷、《天主性體》六卷、《三位一體》三卷、《萬物原始》一卷、《天神》五卷、《形物之造》一卷^⑰、《靈魂》六卷、《首人受造》四卷、《主教要旨》一卷、《不得已辯》一卷、《昭(紀)[事]經典》一部、《司鐸典要》一部、《七聖事禮典》一部、《司鐸課典》一部、《聖教簡要》一部、《正教約徵》一卷、《獅子說》一卷、《進呈鷹論》一卷、(《聖母小日課經》一卷、《善終瘞塋禮典》一卷、《已亡者日課經》一卷。)^⑱

【中國文獻解題】內容如下：

參考譯文：1637年，來自西西里的耶穌會士利類思首次來華。在中國的傳教生涯中，他長期受到皇室的恩寵與支持，直到1682年去世。利類思創作了20部小型作品，其中最為人所矚目的當屬《不得已辯》。這部作品是對楊光先所著《不得已》猛烈攻擊基督教信仰的回應。楊光先是欽天監的一名高官，他似乎出於嫉妒耶穌會士因數學成就所獲得的成功而大受刺激。這引發了整個帝國對基督教的激烈迫害，這場迫害從1665年初開始，一直持續到1671年。利類思在《不得已辯》中逐一反駁了楊光先的諸多錯誤言論。此外，利類思還翻譯出版了敬禮聖母瑪麗亞的禱文集《聖母小日課經》。《已亡者日課經》同樣出自利類思之手，是一本為亡者祈禱的譯文集。^⑲

偉烈亞力收入“利類思”條目的作品有三，後兩部《聖母小日課經》和《已亡者日課經》都未見於梵蒂岡藏本，僅在法國藏本中才有。

另一個例證是在“艾儒略”條目中有一部作品《彌撒祭義》，該書名見於法國藏本；而在梵蒂岡藏本中，其書名為《昭事祭義》。所以由此兩條可知，除梵蒂岡藏本外，偉烈亞力應該也持有法國藏本的《姓氏》。

對照《中國文獻解題》和《姓氏》兩個藏本的目錄可以發現，偉烈亞力在選目時有幾個特點：

第一，對傳教士的作品沒有照單全收，而是有所選擇，即只選取了一些與天主教教義相關的代表性著述，且個別書名因版本流變也略有差異。

以《姓氏》“艾儒略”條目（附艾儒略簡要生平）為例，梵蒂岡藏本共收錄25部作品，內容如下：

艾儒略 字思及

意大理亞國人。明萬曆四十一年癸丑至。先進朝，徐文定公迎歸上海，轉行浙江，弘宣聖教。葉相國福唐復延入閩，閩中稱為西來孔子，受教者甚眾。大清順治二年乙酉卒，墓在福州。

著《天主降生言行紀略》八卷、《降生引義》、《昭事祭義》二卷、《滌罪正規》、《萬物真原》、《三山論學》、《西學凡》、《性靈篇》、《性學摘述》、《職方外紀》五卷、《西方答問》二卷、《幾何要法》四卷、《景教碑頌》註解、《聖體要理》、《聖體禱文》、《出像經解》、《十五端圖像》、《聖夢歌》、《利瑪竇行實》、《熙朝崇正集》四卷、《楊淇園行略》、《張彌克遺跡》、《悔罪要旨》、《五十言》、《四字經》。

【法國藏本】內容如下：

艾儒略 字思及

意大理亞國人。明萬曆四十一年癸丑至。先進朝，徐文定公迎歸上海，轉行浙江，弘

宣聖教。葉相國福唐復延入閩，閩中稱為西來孔子，受教者甚眾。至大清順治二年乙酉卒，墓在福州府北門外十字山。

著《天主降生言行紀略》八卷、《降生引義》一卷、《彌撒祭義》二卷、《滌罪正規》、《萬物真原》一卷、《三山論學》一卷、《西學凡》一卷、《性靈篇》一卷、《性學摘述》、《職方外紀》五卷、《西方答問》二卷、《幾何要法》四卷、《景教碑頌》註解、《聖體要理》一卷、《聖體禱文》、《出像經解》一卷、《十五端圖像》一卷、《聖夢歌》一卷、《利瑪竇行實》一卷、《熙朝崇正集》四卷、《楊淇園行略》一卷、《張彌克遺跡》一卷、《悔罪要旨》一卷、《五十言》一卷、《四字經》一卷。

《中國文獻解題》所收艾儒略的作品則精選為 10 部，分別是《天主降生言行紀略》、《耶穌言行紀略》^②、《彌撒祭義》^③、《滌罪正規》、《萬物真原》、《三山論學紀》^④、《領聖體要理》^⑤、《聖夢歌》、《四字經》和《大西利先生行跡》^⑥。其中與《姓氏》（梵蒂岡藏本）相吻合的有 8 部；與《姓氏》（法國藏本）相吻合的有 9 部，因法國藏本收《彌撒祭義》而梵蒂岡藏本有書名為《昭事祭義》，很有可能是同一部作品。

將《中國文獻解題》與梵蒂岡藏本《姓氏》對照，偉烈亞力共錄 15 位耶穌會士的 33 部作品；與法國藏本《姓氏》對照，偉烈亞力共錄 15 位耶穌會士的 36 部作品。15 位耶穌會士名錄完全一致，其中多出來的三部作品正是法國本所錄而梵蒂岡本所未收之艾儒略《彌撒祭義》以及利類思《聖母小日課經》和《已亡者日課經》。

通過以上分析可知，此部分收入的基督教中文文獻選目，確如偉烈亞力所言使用了《聖教信證》後附《耶穌會西來諸位先生姓氏》梵蒂岡和法國兩個藏本提供的書目，這是他明確提及的重要參考文獻。然誠如前文所析，細究這 90 部作品，在上述名錄中可互見的條目僅略及三分之一強，且主要是早期天主教傳教士的作品，那麼還有近 60 部作品，尤其是奉教文人和新教傳教士的作品又來自何處？筆者推測，極有可能來自於偉烈亞力後期看到的書館目錄和差會印書目錄等資料。偉烈亞力隸屬倫敦會，1847 年抵達上海後，曾協助麥都思（W. H. Medhurst）管理墨海書館。除 1860 年至 1863 年短暫返英外，一直在華從事傳教和相關學術活動。作為倫敦會成員，偉烈亞力非常熟悉當時上海倫敦會的藏書情況，加之他曾管理過墨海書館，對該館的宗教、科學出版活動及書刊收藏也比較了解。1857 年，他專門編纂了一本小冊子，輯錄了四份書目，以《倫敦會藏書目錄》（*Catalogue of London Mission Library*）為名在上海印製。雖然封面上未提及著者，但核查其所編《基督教新教傳教士在華名錄》，可明確這本小冊子正是出自偉烈亞力之手。^⑦

《倫敦會藏書目錄》由四部分組成：（一）倫敦會和倫敦聖教書會捐贈予上海倫敦會傳教士使用的書籍（Books Granted by the London Missionary and Tract Societies, For the Use of the London Missionaries at Shanghai），共 527 種；（二）屬倫敦會的書籍（Books Belongings to 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共 481 種；（三）雒魏林贈送給倫敦會的中文書籍（Chinese Books: Presented to 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by W. Lockhart, ESQ），共 642 種；（四）麥都思留給上海倫敦會成員使用的書籍（Books Belong to Rev. Dr. Medhurst; Left for the Use of the Members of the London Mission Shanghai），共 345 種。據蘆笛考察，這份目錄收錄了麥都思於 1856 年回國後上海倫敦會所擁有的 2,063 種中外文書籍和刊物（含稿本），大部分與基督教主題相關，還包括一批自然科學設備。由於這份目錄並非公開發行的出版物，主要是供倫敦會內部使用，故印製時在封面未標明出版社和著者偉烈亞力的信息。書目上所錄的書籍主要基於上海倫敦會之藏書，又獲得了來自倫敦會總部和聖公會

的支持,以及雒魏林和麥都思的個人捐贈。這些藏書曾分屬或由麥都思、艾約瑟、韋廉臣(A. Williamson)、楊格非(G. John)、慕維廉(W. Muirhead)、偉烈亞力和雒魏林7人保管。^②由此可知,《倫敦會藏書目錄》不僅對考察19世紀中葉該會在上海的藏書情況極具價值,而且可以為考證《中國文獻解題》的部分資料來源提供新的參考。

為印證這一猜想,筆者依據1857年《倫敦會藏書目錄》^③做了進一步的詳細考查,最終確定偉烈亞力還利用了當時倫敦會在上海的藏書來完成《中國文獻解題》基督教中文文獻部分的選目。他主要採用的是第三份“由雒魏林贈送的書籍目錄”和第四份“麥都思留給倫敦會的藏書目錄”。

筆者整理這90部作品在三個目錄中的情況後發現,其中32部僅見於《倫敦會藏書目錄》;其中16部同時見於《姓氏》梵蒂岡和法國藏本及倫敦會三個目錄;18部只見於《姓氏》梵蒂岡和法國藏本;見於《姓氏》法國藏本和倫敦會目錄的有2部;三個目錄均未見的合計22部。(具體書名參見前文第一部分“所收基督教文獻概況”作品細目)由此可見,《中國文獻解題》超過一半的基督教中文文獻作品名錄源自《倫敦會藏書目錄》。

偉氏著錄的第二個特點是:上述三個目錄所載傳教士著述十分簡要,僅為書名和卷數;偉氏則不然,除基本信息外,對所錄文獻還撰有詳略不等的解題,同時輔以重要傳教士生平簡述。進一步考察可以發現,《中國文獻解題》是以《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為重要參考依據,凡參考《總目》之處總體敘述大致相當,個別甚至比《總目》更詳細;但也要注意,偉氏的記敘中存在不確之處。

此處以利瑪竇的作品為例略作考辨。《姓氏》中所錄“利瑪竇”條目內容如下(梵蒂岡與法國兩個藏本一致):

利瑪竇 字西泰

意大理亞國人。明萬曆九年辛巳至,先傳教粵東諸郡,轉至江西,後寓金陵。二十八年庚子,同龐迪我齋方物進朝。神宗恩賚極厚,欽賜官職,固辭不受。蒙上眷注,始留京師,偕龐迪我僦屋以居,日用取給於光祿,遵上命也。至三十八年庚戌四月卒,御賜祭葬,墓在北京阜成門外滕公柵欄。有《行略》行世。

著《天主實義》二卷、《畸人十篇》二卷、《辯學遺牘》一卷、《幾何原本》六卷、《交友論》一卷、《同文算指》十一卷、《西字奇蹟》、《西國記法》、《測量法義》、《萬國輿圖》、《乾坤體義》三卷、《勾股義》、《二十五言》一卷、《渾蓋通憲圖說》二卷、《圓容較義》一卷。

《中國文獻解題》在簡要介紹利瑪竇的生平之後,收入他的五部作品:《交友論》、《天主實義》、《二十五言》、《畸人十篇》和《辯學遺牘》^④,並分別做了解題。

偉烈亞力對《交友論》的解題是:“利瑪竇最初的努力之一是在江西首府南昌居住時。有一天,他遇到了建安王,被問及西方世界有關友誼的法則;這次談話的結果是他於1595年完成了短篇論著《交友論》,在一連串短小精悍的段落中闡明了他的觀點。”^⑤《總目》卷一二五錄《交友論》一卷:“萬曆己亥利瑪竇遊南昌,與建安王論友道,因著是編以獻。其言不甚荒悖,然多為利害而言,醇駁參半。如云友者過譽之害,大於讎者過譽之害,此中理者也。又云多有密友,便無密友,此洞悉物情者也。至云視其人之友如林,則知其德之盛;視其人之友落落如晨星,則知其德之薄;是導天下以濫交矣。又云二人為友,不應一富一貧,是止知有通財之義,而不知古禮惟小功同財,不概諸朋友,一相友而即同財,是使富者愛無差等,而貧者且以利合,又豈中庸之道乎?王肯堂《鬱岡齋筆塵》曰:利君遺余《交友論》一編,有味哉其言之也。使其素熟於中土語言文字,當不止是。乃稍刪潤著於篇,則此書為肯堂所點竄矣。”^⑥編纂緣由二者內容上相差無幾,不過偉氏對《交友論》的成書時間和

寫作特點略有提及，卻省去了《總目》後文對《交友論》具體內容之評介，以及王肯堂對此書的評價和潤色工作。

偉烈亞力對《天主實義》的解題是：“1601年，利瑪竇在北京居住期間，每天都與上層學者交往，得以創作出版了《天主實義》，這是一部關於天主的特徵和屬性的專論，分八篇論述該主題，即：天地萬物的創造和存續；人類對天主的無知；人與禽獸的區別在於擁有不滅的靈魂；人魂與鬼神有異，以及天下萬物的多樣性；駁斥佛教六道輪回和禁殺生之說，闡釋天主教齋戒和禁慾本旨；意志的不滅性，以及天堂地獄賞善罰惡的確定性；人性本善和天主教的特殊教義；介紹歐洲習俗，尤其是神職人員的禁慾主義。作品採用對話形式，其中包含了一些精闢的推理來支持他所提出的主張。基督信仰的教義僅僅被輕描淡寫地提及。佛教教義受到猛烈抨擊，作者試圖將基督教與儒家學說相提並論。”^③對照《總目》卷一二五錄《天主實義》二卷：“是書成於萬曆癸卯，凡八篇。首篇論天主始制天地萬物而主宰安養之。二篇解釋世人錯認天主。三篇論人魂不滅，大異禽獸。四篇辨釋鬼神及人魂異論，論天下萬物不可謂之一體。五篇排辯輪回六道戒殺生之謬，而明齋素之意在於正志。六篇解釋意不可滅，並論死後必有天堂地獄之賞罰。七篇論人性本善，並述天主門士之學。八篇總舉泰西俗尚，而論其傳道之士所以不娶之意，並釋天主降生西土來由。大旨主於使人尊信天主，以行其教。知儒教之不可攻，則附會六經中上帝之說以合於天主，而特攻釋氏以求勝。然天堂、地獄之說與輪回之說相去無幾，特小變釋氏之說，而本原則一耳。”^④可知二者解題內容也基本一致，但偉氏省去最後一句有關基督教天堂地獄與佛教六道輪回之說關係之評述。

偉烈亞力對《二十五言》的解題是：“1604年，利瑪竇完成了《二十五言》，這是由25篇短文組成的一個系列，主要是道德方面的文章；但它們幾乎沒有涉及基督教體系中獨特而本質的教義。該書有馮應京^⑤和徐光啟的序言，他們都是教會歷史上的名人”^⑥。《總目》卷一二五著錄《二十五言》一卷：“西洋人之入中國自利瑪竇始，西洋教法傳中國亦自此二十五條始。大旨多剽竊釋氏，而文詞尤拙。蓋西方之教惟有佛書。歐羅巴人取其意而變幻之，猶未能甚離其本。厥後既入中國，習見儒書，則因緣假借以文其說，乃漸至蔓衍支離，不可究詰，自以為超出三教上矣。附存其目，庶可知彼教之初。所見不過如是也。”由於《總目》對該書評價較低，且對其教義多有貶損，故偉氏並未採用。此書通行的《天學初函》本，前有馮應京《重刻二十五言序》，末有徐光啟《跋二十五言》。這一點偉氏有所提及，卻未明確序跋之別。

偉烈亞力對《畸人十篇》的解題是：“利瑪竇還有一部《畸人十篇》，完成於1608年，記錄了他在不同時期與當地高官顯貴的十次對話，涵蓋諸多主題，如：‘人壽既過猶誤為有；人於今世惟僑寓耳；常念死候利行為祥；常念死候備死後審；君子希言而欲無言；齋素正旨非由戒殺；自省自責無為怨尤；善惡之報在身之後；妄詢未來自速身凶；富而貪吝苦於貧窶。’1609年，他另撰《西琴曲意》八章，附於《畸人十篇》之後。”^⑦有關《畸人十篇》的具體內容，偉氏的題解與《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二五（錄《畸人十篇》二卷附《西琴曲意》一卷）基本上沒有差別，但《總目》對《畸人十篇》及所附《西琴曲意》有較詳細的闡釋：“是書成於萬曆戊申，凡十篇，皆設為問答以申彼教之說……其言宏肆博辨，頗足動聽，大抵掇釋氏生死無常、罪福不爽之說，而不取其輪回戒殺不娶之說，以附會於儒理，使人猝不可攻，較所作《天主實義》純涉支離荒誕者，立說較巧。以佛書比之，《天主實義》猶其禮懺，此則猶其談禪也。末附《西琴曲義》八章，乃萬曆庚子利瑪竇觀京師所獻，皆譯以華言，非其本旨，惟曲意僅存，以其旨與十論相發明，故附錄書末焉。”^⑧

偉烈亞力對《辯學遺牘》的解題是：“前述作品對佛教的尖銳攻擊，以及利瑪竇的學說透過重印

在帝國各地廣泛傳播,引起了佛教徒的不滿和反對。然而,他們的論辯力量非常薄弱。其中最具有才華的一位是杭州高僧祿宏,他棄官隱修。在他所發表的著作中,有三篇反對耶穌會教義的文章。這些文章引起了京城高官虞淳熙的注意,他以非常坦誠的態度寫信給利瑪竇,要求進一步了解這個問題。此信連同利瑪竇的回信、僧人的三篇辯護以及利瑪竇的反駁,以《辯學遺牘》為題一並出版,並附徐光啟題跋。^⑧《總目》卷一二五《辯學遺牘》一卷:“是編乃其與虞淳熙論釋氏書,及辨蓮池和尚《竹窗三筆》攻擊天主之說也。利瑪竇力排釋氏,故學佛者起而相爭,利瑪竇又反唇相詰,各持一悠謬荒唐之說,以較勝負於不可究詰之地。不知佛教可闢,非天主教所可闢,又非佛教所可闢。均所謂同浴而譏裸裎耳。”^⑨兩者對照,偉氏對成書前因後果的記載更為詳細;但又明顯迴避了《總目》對作品內容的尖銳批評。所言徐光啟曾為《辯學遺牘》作跋,實則有誤,查當時通行的《天學初函》本,兩篇後跋的作者實為涼庵居士(李之藻)和彌格子(楊廷筠)。

結 語

通過本文的考證,《中國文獻解題》所載基督教中文文獻的選目來源,約有三分之一以《聖教信證》後附《耶穌會西來諸位先生姓氏》梵蒂岡和法國兩個藏本為基礎,另有約三分之一來自偉烈亞力自己所編的《倫敦會藏書目錄》(如若將《倫敦會藏書目錄》加上與《姓氏》兩個藏本互見的作品合計則多達 50 部),目前仍有約四分之一作品尚未查明出處。另外,偉氏也參閱了柏應理的拉丁文本《耶穌會神父名錄》。提要部分則主要採用和借鑒了《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的提要。通過對所收書目及解題的具體分析可知,這些著述大多數是偉氏本人目驗得來,絕非簡單謄抄自二手資料。

伯希和(Paul Pelliot)曾言治漢學的三個必備條件,第一就是目錄與藏書。“西方漢學目錄沉澱了西方世界認識中國的知識史,記錄了他們對中國自然地理、政府體制、典章經籍、文史宗教、社會經濟等各方面認識的逐步深化,集中體現了西方漢學的發展脈絡和知識體系,具有重大的意義和價值。”^⑩從近代東西知識環流的角度來看,西方漢學目錄既是西方研究中國學問之發端,亦是中國學界研究西方漢學之基礎。《中國文獻解題》作為一部介紹中國古代文獻的解題目錄,為西方漢學界提供了一個相當完備的漢籍知識寶庫,也奠定了西方漢學文獻目錄學之基石。除中國古代傳統典籍外,該書還收入了不少明清時期的西學漢籍和西方傳教士的宗教作品,這說明偉烈亞力在挑選文獻編選書目時依然不忘其傳教士的身份背景,亦對自耶穌會入華以來的“書籍傳教”的策略深具認同感。這些入選的中文宗教作品,是來華天主教和新教傳教士試圖借助文字傳播基督教思想和觀念的有利工具,成為明清之際中西文化雜糅的重要見證。在偉烈亞力之前,已知由西方人以西文編撰的明清基督教中文文獻目錄,當屬柏應理的《耶穌會神父名錄》拉丁文本,但該書僅錄書名,未見解題。可以說,《中國文獻解題》收錄的 90 部基督教中文作品或屬第二部,但體例和詳實程度均遠遠優於前者,甚至對《基督教新教傳教士在華名錄》一書的編纂亦有一定影響。在偉烈亞力明清基督教中文文獻目錄的基礎上,又陸續誕生了費賴之(Louis Pfister)編寫的《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和榮振華(Josephe Dehergne)的《補編》,進一步完善和豐富了這一系列書目的內容和資料。而究其源頭,偉烈亞力的奠基之功不容忽視。

[本文撰寫過程中,承蒙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中國文化研究院謝輝副研究員協助核查相關資料,並提供了重要的書目信息和藏本情況,謹致謝忱]

① *Notes on Chinese Literature* 或譯為《中國文獻紀略》、《漢籍解題》，本文採用《中國文獻解題》作為漢譯名。此作品因其重要價值，在 19 世紀中西文化交流史相關研究中被頻繁引用，如王燕《〈漢籍解題〉的小說目錄學價值》（北京：《文學遺產》，2012 年第 1 期）、俞森林《中國道教經籍在十九世紀英語世界的譯介與傳播》（成都：《社會科學研究》，2012 年第 3 期）、宋莉華《西方早期漢籍目錄的中國文學分類考察》（北京：《中國社會科學》，2018 年第 10 期）等，但深入的專題研究並不多見，其著錄典籍的史源尚未真正探明。

②③⑦②⑨ Alexander Wylie, *Notes on Chinese Literature*,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67, p. 138; pp. 138-143; preface, p. iv; pp. 138-139.

④參見徐宗澤：《明清間耶穌會士譯著提要》，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 年，第 347 頁。

⑤⑪③③⑦②⑨ 永瑤等撰：《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二五，子部·雜家類存目二，北京：中華書局，2022 年，第 1080 頁；第 1080 頁；第 1080 頁；第 1079 頁；第 1080 頁。

⑥《辯學遺牘》包括《虔德園銓部與利西泰先生書》、《利先生覆虔銓部書》、《附雲棲遺稿答虔德園銓部書》及《利先生覆蓮池大和尚竹窗天說四端》四篇文章，後附李之藻和楊廷筠所撰跋語。

⑧⑪謝輝：《明清之際西學漢籍序跋目錄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 年，“前言”第 28~29 頁。

⑨王重民：《中國古籍善本提要》，北京：中華書局，1983 年，“附錄”第 4 頁。

⑩館藏號為：BARBERINI ORIENT 134.4, Borgia CINESE 350.31, RACCOLTA GENERALE ORIENTE III 222.10, 222.11, 246.6。參見謝輝：《明清之際西學漢籍序跋目錄集》，“前言”第 28~29 頁。

⑫兩個藏本的具體差異考證情況，請參見謝輝：《明清之際西學漢籍序跋目錄集》，“前言”第 29~30 頁。

⑬館藏號為：Jap.Sin.I 191。

⑭現藏奧地利國家圖書館，編號為 42.W.39。

⑮偉氏稱柏應理將拉丁文版傳教士名錄附於其《歐洲天文學》之後，該書作者實為南懷仁。Alexander

Wylie, *Notes on Chinese Literature*, p. iv.

⑯此處疑有闕誤。

⑰這一部分為梵蒂岡本“三行半墨釘”處補足內容。

⑱這部作品梵蒂岡本未錄。

⑲後三部為梵蒂岡本“五行半墨釘”處補足內容。

⑳ Alexander Wylie, *Notes on Chinese Literature*, p. 141. 原文中 Louis Bugli 漢名作“利類斯”，今通行作“利類思”。

㉑偉烈亞力稱此書為《天主降生言行紀略》的刪節版，見於倫敦會目錄。

㉒此書名見法國藏本《姓氏》。

㉓此為《姓氏》梵蒂岡和法國藏本之《三山論學》。

㉔此為《姓氏》梵蒂岡和法國藏本之《聖體要理》。

㉕此為《姓氏》梵蒂岡藏本之《利瑪竇行實》，法國藏本之《利瑪竇行略》，倫敦會目錄之《泰西利瑪竇行跡》。

㉖ Alexander Wylie, *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 Giving a List of Their Publications, and Obituary Notices of the Deceased*,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pp. 173-175.

㉗參閱蘆笛：《上海倫敦會早期藏書研究——基於 1857 年〈倫敦會藏書目錄〉的考察》，北京：《世界宗教文化》，2015 年第 4 期。

㉘該目錄現藏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圖書館特藏室，由李偉華博士代為複製。

㉙③②③⑤③⑥③此為參考譯文。Alexander Wylie, *Notes on Chinese Literature*, pp. 138-139.

③④原文此處中文為“馮應景”，疑為“馮應京”之誤。

④④孟慶波：《略論西方漢學目錄研究的意義、材料和方法》，南京：《南京理工大學學報》，2024 年第 4 期。

作者簡介：李真，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中國文化研究院教授，北京中外文化交流基地研究員，江蘇科技大學外國語學院客座研究員，博士。北京 100089

[責任編輯 陳志雄]